

# 浅议基督教修道生活兴起于埃及 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因素

——从安东尼的社会地位谈起

董晓佳

〔摘要〕兴起于公元 3 世纪后期至 4 世纪中期的基督教修道生活,对基督教世界以及人类文明有着深远影响。基督教修道生活之产生,本身是当时的社会危机、基督教会世俗化后带来的腐败与虚浮、东方其他宗教的禁欲传统,以及基督教的相关教义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之所以选择了埃及这个罗马帝国的东方行省作为修道生活的滥觞之地,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埃及当时具有适宜修道生活萌生并成长的土壤。在对这一历史进程有所贡献的各种因素之中,埃及在这一特定时期中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促使其他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催化剂,而埃及当时的社会结构则为修道生活最先在此处兴盛发展提供了平台。

〔关键词〕埃及;基督教修道生活;经济环境;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2-0133-13

〔作者简介〕董晓佳,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300071

基督教修道生活(以下简称修道生活)于公元 3 世纪后期至 4 世纪中期兴起于埃及,迅速在罗马帝国东部地区传布,形成了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三大中心,并在 4 世纪中后期传播至现代西欧地区。近现代学者对修道生活兴起的原因有各种分析。

国外学者中,布克哈特认为,“当一个人在茫茫的庸碌世界里感到迷失方向的时候,人的本性就会让他在孤独中寻找真正的自我”,“隐修生活方式乃是以社会和不个人健康的不完全健康的状态为前提的”,是一种属于危机时代的生活方式。<sup>①</sup> 汤普逊指出修道生活的根源“可在以前的许多宗教里找出”,认为它“是采自东方的异教信仰的”;而教会本身的世俗化则是更根本的原因,修道生活是对“教会中已腐败透顶的世俗性、财富和虚浮性”的抗议,也为厌倦社会现实的人提供了“一个绝望的出路”。<sup>②</sup> 威尔·杜兰指出,“修道生活对于许多人而言,乃是躲避蛮族入侵混乱和战争的避风港”<sup>③</sup>。彼得·布朗认为,“4 世纪席卷罗马世界的修道主义植根于一群自我定义的‘被替代者(displaced persons)’”,他们宣称开始了全新的生命”,随后又指出,“我们对修道运动的起源知之甚少”。<sup>④</sup> 杜恩总结了各派学者对修道生活兴起的不同解释,包括“对 4 世纪基督教的帝国化的回应”、“一种回归基督教殉道者价值观的召唤”、“一种广泛深刻的焦虑的结果”、“犹太教禁欲主义传统的延续”或“对使徒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经济危机”。<sup>⑤</sup>

<sup>①</sup>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宋立宏、熊莹、卢彦名译,宋立宏审校,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264-265 页。

<sup>②</sup>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 年)》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73-174 页。

<sup>③</sup> [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第 4 卷,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2 页。

<sup>④</sup> 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1, pp. 98-101.

<sup>⑤</sup> Marilyn Dunn,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From the Desert Fathers to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p. 1-2.

国内学者中,王晓朝强调基督教成为国教后教会的世俗化导致了突破基督教崇拜仪式限制的修道生活的兴盛<sup>1</sup>;陈志强认为“拜占廷修道院起源于基督教早期历史上禁欲苦修的思想”,其兴起于此时的原因在于“当时,罗马帝国社会危机严重……避世思想流行”<sup>④</sup>。王亚平认为,“隐修士的出现”是“以脱离现实社会的方式、忘我的精神、对宗教的虔诚来抗议教会中已很强的世俗性,以及财富给教会带来的腐败和虚浮”,“厌倦一切的情绪使人们渴望逃避现实社会”<sup>⑤</sup>。田明指出埃及成为修道制度起源地是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主义和气候环境等综合作用的结果<sup>⑥</sup>。

综上所述,论者一般认为公元3世纪后修道生活之兴起乃是源于对社会现实之种种不满,而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中的禁欲苦修传统为其思想源头,至于它为何会首先出现于埃及,则一般归之于埃及的地形与气候适合修道生活<sup>⑦</sup>,或是埃及有隐修的先例<sup>⑧</sup>。前人论述均有各自道理,但是其中仍为后学继续探讨留下了空间。首先,自然环境只是为修道生活提供了一个平台,它对采用个人修道或集体修道的方式有影响<sup>⑨</sup>,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决定埃及必然成为修道生活滥觞之地的原因。其次,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的隐修先例或传统<sup>⑩</sup>对修道生活的影响自然无法排除,但也无法解释为何修道生活不前不后恰于此时勃兴于此。再次,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或许是两个因素得以起作用的关键,但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是,修道生活是起源于经济相对繁荣的帝国东部地区,而更为衰落的帝国西部地区并未自发产生出修道生活,因此,无法仅用经济或社会危机解释这一现象。最后,修道生活在东部首先兴起自然有此地是基督教初起之地,同时各种禁欲苦行思想与传统在东部地区也更为盛行的原因,但同样明显的历史事实是,修道生活的最初代表性人物并非深谙神学的教士或是基督教思想家。希腊教会的著名教父,如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塔那修斯(Athanasius, Bishop of Alexandria 约296–373年)、凯撒里亚的瓦西里(Basil of Caesarea 约329–379年)、纳西盎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 约325–389年)与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 约347–407年)均是修道生活的推动者、支持者乃至参与者,他们的活动促进了修道生活的兴盛与发展,但修道生活早在他们参与和支持之前已经勃然发起于埃及以及罗马帝国东部其他地区,他们只是敏锐地注意到了蓬勃发展的修道生活的重要性和影响,从而力图以各种手段与方式使其有利于教会以及基督教的发展。就另一个方面而言,埃及早期基督教修道生活的代表性人物安东尼(Antony 约251–356年)在决定开始过修道生活之前对神学并无高深造诣,所谓禁欲思想或遁世哲学对他选择修道生活究竟有何种程度的影响是令人怀疑的。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会内部对于修道生活的利弊并未达成共识,由于担心教会在教徒中的影响力被修道士削弱,不乏反对苦行修道的教士。主教们大多有保留地看待修道主义,因为它开始时处于教会控制之外。<sup>⑪</sup>直至4世纪中后期的冈拉会议(The Synod of Gangra)<sup>⑫</sup>上,由于脱离了教会控制,以亚美尼亚的塞巴斯特主教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 Bishop of Sebaste)为精神领袖的一派苦行修道士仍然受到了严词谴责。<sup>⑬</sup>因此在修道生活

<sup>1</sup> 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44页。

<sup>④</sup> 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sup>⑤</sup>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sup>⑥</sup> 田明:《论修道制度兴起的埃及因素》,《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

<sup>⑦</sup>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第174–175页。

<sup>⑧</sup>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第269页。

<sup>⑨</sup> 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第182页。

<sup>⑩</sup>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4卷,第82页。

<sup>⑪</sup> Charles A. Frazee “Late Roman and Byzantine Legislation on the Monastic Life from the Fourth to the Eighth Centuries”, *Church History*, Vol 51, No 3 (1982) p 263

<sup>⑫</sup> 关于冈拉会议的召开时间,学者们颇有分歧,能确定的时间段是325年–381年之间,也就是325年尼西亚会议和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之间。参见Henry R. Percival ed. *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 of the Undivided Church: Their Canons and Dogmatic Decrees*,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2, pp 89–90

<sup>⑬</sup> Henry R. Percival ed. *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 of the Undivided Church: Their Canons and Dogmatic Decrees*, p 91.

的兴起与遁世主义思想的发展之间,或许存在着一种实践力行推进理论建设,理论建设又反过来促进实践力行的双向影响。至于民族主义,这本是伴随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才出现的概念,3世纪后期埃及居民对帝国政府的反感情绪是否能被定义为民族主义呢?或者,这种反感究竟仅仅是因为受罗马人统治而产生,还是由于受到罗马人的残酷压榨而产生的呢?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对所谓罗马帝国统治下埃及地区居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学术关注,与同时期民族主义思潮在全球的发展有无关联呢?无论如何,修道生活、修道制度之起源,仍然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当时罗马帝国东部尤其是埃及地区与帝国西部有所不同的社会结构为修道生活最先在此处兴盛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在本文中,笔者将试图从安东尼这位代表性人物入手,结合他投入修道生活的具体情况,分析埃及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环境对于人们选择投入基督教修道生活的影响,希望能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于促使基督教修道生活兴起的原因提出管见以为引玉之砖。

## 一 安东尼的社会地位与早期教育

被后人尊为“隐居修道之父”<sup>1</sup>的埃及修道士安东尼,生活于公元3世纪后期至4世纪前期,在父母去世后入沙漠修道。他长期修道的事迹传出后,大批仰慕者前来拜访,听他讲道,许多人经过他的劝导投身修道生活。他们居住在他周围,令“沙漠成为了修道士的城市”。<sup>④</sup>

安东尼当然不是沙漠中的第一名隐士,公元1世纪时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约公元前20年—公元50年)在其著作中就曾详细描述了埃及地区的隐修团体,称这些隐士把财产给子女亲戚或朋友后,在城外过着隐居生活,这些团体在亚历山大里亚特别兴盛。<sup>②</sup>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约260—340年)注意到斐洛的记述,并在其《教会史》中径直声称斐洛所描绘的是埃及的基督教修道士<sup>③</sup>。5世纪中后期的教会史家索佐门(Sozomen)也赞同尤西比乌斯的说法,认为斐洛所描述的隐修者是一些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sup>④</sup>。而现代学者则对这些隐修者是否是基督徒有很大保留<sup>⑤</sup>。但无论这些埃及的苦行社团是属于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或其他宗教,它们对后世基督教修道生活的影响显然不及被神圣化了的安东尼。这些隐修团体之所以为后世重视,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尤西比乌斯在《教会史》中把它们归为早期基督教隐修团体。<sup>⑥</sup>著名拉丁教父杰罗姆(Jerome约349—420年)在其文章中宣称第一名修道士乃是一位名为保罗的埃及人,据说此人在戴西乌斯皇帝(Decius在位期249—251年)迫害基督徒时期隐居于沙漠,113岁时与安东尼相会并指导其隐修方式。<sup>⑦</sup>5世纪前期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史家苏格拉底(Socrates Scholasticus)在其著作中提到埃及的修道院“可能很久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是由一位名为阿姆恩(Ammoun)的虔诚者大为扩展”。<sup>⑧</sup>安东尼在其隐居修道之初,也曾向其村庄附近的年老隐士求教。<sup>⑨</sup>可以确定的是,在

<sup>1</sup> Ian C Hannah, *Christian Monasticism: A Great Force in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5, p. 21

<sup>④</sup> Athanasius, *Life of St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by Robert C Gregg, New Jersey: Paulist Press, 1980, pp. 42-43

<sup>②④</sup> Philo, “On the Contemplative Life or Suppliants (De Vita Contemplativa)”, *Philo*, Vol. X., translated by F. H. Col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I 2, II 13-21.

<sup>③</sup> Eusebius, *The Church History*, translated by Paul L. Maier,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9, 2: 17, pp. 73-76

<sup>⑤</sup> Sozom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Chester D. Hartranft,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86, I: 12

<sup>③</sup> Eusebius, *The Church History*, p. 73, note 1

<sup>⑥</sup> Philo, “On the Contemplative Life or Suppliants (De Vita Contemplativa)”, introduction, pp. 104-108

<sup>⑦</sup> Jerome, “The Life of St Paul the First Hermit”, in Helen Waddell translated *The Desert Fath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pp. 30-37

<sup>⑧</sup>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A. C. Zeno,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86, IV, 23

<sup>⑨</sup> Athanasius, *Life of St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 p. 32

安东尼之前,埃及地区就已经有人过着隐居苦修生活。安东尼之得享大名,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塔那修斯居功至伟。当安东尼于356年逝世后,阿塔那修斯撰写了《安东尼传》。在这部传记中,阿塔那修斯把基督教早期修道生活代表性人物安东尼个人的苦修行为与当时埃及修道生活之兴盛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安东尼“隐居修道之父”的荣名。

关于《安东尼传》的写作原因,阿塔那修斯自称为是为了满足一些人想要更多了解安东尼的渴望<sup>①</sup>,而后世有学者认为阿塔那修斯撰写这一著作的原因在于利用安东尼的名声作为反对阿里乌派(the Arians)的工具,并借此书宣传修道生活应受到教会控制与指导<sup>②</sup>,或是为阿塔那修斯自己的神学立场背书<sup>③</sup>。考虑到阿塔那修斯一生不仅用实际行动与阿里乌派及其支持者对抗,而且在颠沛流离的放逐生涯中写下了众多批驳阿里乌派的文章与信件<sup>④</sup>,他在写作《安东尼传》的过程中,若涉及到相关问题,自然会秉承其一贯立场。无论阿塔那修斯写作时究竟有何目的,就其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安东尼传》显然是一部成功之作,不仅安东尼的形象成为此后修道士圣徒的标准,传记本身也成为基督教圣徒传记的所遵循的模本。<sup>⑤</sup>同时,《安东尼传》也成为后世研究安东尼的最主要史料。

根据阿塔那修斯的记载,安东尼的父母出身良好且家境富裕<sup>⑥</sup>,当他父母去世后,除了房屋与动产外,他还继承了由祖上留下的300阿鲁拉(arura,1阿鲁拉约合三分之二英亩)肥沃田地<sup>⑦</sup>。单纯地看这个数字,的确并无出奇之处,但是当我们把眼光从安东尼的家产扩大到整个埃及来看时,就会发现安东尼家庭的富裕程度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根据巴格纳尔的统计,当时在埃及,拥有100阿鲁拉以上土地的城市贵族在多数诺姆(nome)不超过100户,并且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大多分散于不同的村庄而非集中于一处;拥有70阿鲁拉以上土地的农户一般不超过当地人口的10%;拥有10阿鲁拉以上、70阿鲁拉以下的农户则占当地人口的75%以上。<sup>⑧</sup>根据纸草文献进行统计,在法雍绿洲(Fayum)的一个名为卡拉里斯(Karanis)的村庄中,14个家庭拥有的土地低于10阿鲁拉,有59个家庭拥有10-39阿鲁拉的土地,拥有40-70阿鲁拉土地的家庭有22个,另有11个家庭的地产超过70阿鲁拉,村庄中四分之三的土地为拥有10-99阿鲁拉土地的家庭所拥有。<sup>⑨</sup>以上这些统计数字一方面说明如同帝国西部那样田连阡陌的大地产主在埃及为数不多,大多数埃及人都是务农为生并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另一方面,如果传记中关于安东尼所拥有的财产记载没有过于夸张,也可以说明安东尼的家庭至少就其经济地位而言可算是居于埃及社会的中上层。在来自埃及城市赫尔墨波利斯(Hemopolis)下属某地区的一份4世纪初期的土地所有者清单中,列出了约200多土地所有者的名字,其中土地最多的14人拥有的土地均在250阿鲁拉以上,其次是60名拥有100-200阿鲁拉土地的所有者,再次有22人在30-100阿鲁拉之间,有90人拥有10-30阿鲁拉土地,有66人拥有的土地少于10阿鲁拉,琼斯认为上述清单中拥有土地最多的14人属于赫尔墨波利斯城的市议员(decursion)阶层。<sup>⑩</sup>当我们把这一数据与安东尼所继承的300阿鲁拉土地进行比较后,安东尼的社会地位也就显而易见了。

《安东尼传》开篇陈述:安东尼的父母是基督徒,以基督徒的方式培养安东尼。当他年幼时与父母共同生活,除父母与家庭外对其他几乎全无了解。在他长大该受教育时,他不喜学习,也希望远

<sup>①</sup> Athanasius, *Life of St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 p. 29

<sup>②</sup> Marilyn Dunn,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From the Desert Fathers to the Early Middle Ages*, pp. 9-10.

<sup>③</sup> Athanasius, *Life of St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 preface, p. xvii

<sup>④</sup> 如《致各教会的公开信》(Encyclical Epistle to the Bishops Throughout the World)、《反阿里乌派》(Against the Arians)、《反阿里乌派的四篇演讲词》(Four Discourses against the Arians)、《阿里乌派史》(History of the Arians)等。

<sup>⑤</sup> ¼ c. Athanasius, *Life of St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 preface, p. xix, p. 30, p. 31.

<sup>⑥</sup> Roger S. Bagnall, *Egypt in Late Antiq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10.

<sup>⑦</sup> Roger S. Bagnall, *Egypt in Late Antiquity*, pp. 117-119.

<sup>⑧</sup>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Vol. II,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4, p. 772.

离其他孩子。他所渴望的乃是在家中平淡的生活。<sup>1</sup> 如果不看“安东尼的父母是基督徒,以基督徒的方式培养安东尼”这句话,我们会发现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内向沉静、依赖父母、性格或许有些许孤僻的年轻人;他既未受到当时中上层社会成员一般应得到的教育,又缺乏处世经验,而这些教育与经验又是身为这一阶层成员者为实现自己和家族的权利以及履行所承担义务之必备素质。此外,如果结合当时的一般情况重新审视“安东尼的父母是基督徒,以基督徒的方式培养安东尼”这句话,我们会发现这种培养方式并非当时中上层基督徒家庭教育子女的普遍做法。虽然在教会内部有争议,但在那个时代,世俗教育一般而言是中上层基督徒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安东尼出身相似的4世纪教会的著名教父如杰罗姆、凯撒里亚的瓦西里、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 生年不详,约逝世于385或386年之后)、金口约翰等均接受过良好的世俗教育,他们也均是修道生活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直到5世纪中期,苏格拉底与另一位教会史家索佐门在著作中仍把朱利安皇帝(Julian, 361-363年在位)禁止基督徒儿童上公立学校以及学习希腊古典文学视为朱利安反基督教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④</sup>。曾参与聂斯托里派(Nestorianism)争论的教会史家塞奥多里特(Theodoret of Cyrhus, 约393-466年)虽自幼接受修道士的教导,但也熟悉荷马(Homer)、修昔底德(Thucydides)、柏拉图(Plato)等人的著作<sup>⑤</sup>。凯撒里亚的瓦西里在谈到基督徒的教育问题时,认为“若异教徒的著作与圣经有偶合之处,则其知识对我们有益;若与圣经有不合之处,则至少可帮助我们发现异教徒的知识与圣经之间的区别,这对于坚定我们的信仰同样重要”,“即使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摩西,也是首先通过学习埃及人的知识训练思维”。<sup>⑥</sup> 实际上,在罗马帝国,与现代社会相似地是,接受教育往往是在社会立足并取得个人发展的有利条件。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如有兴趣与能力往往可以谋得律师、官员、城市发言人、修辞教师等各种职业并逐渐向上升迁。如果他们出身于中上阶层又不想远离家乡,也可以留在家中管理田产,并担任所在城市议员或充任村庄与政府之间的中介人,同时组织当地的公共赛会和其他活动,而妥善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则来自于教育与实践经验。因此,阿塔那修斯所说安东尼的父母“以基督徒的方式培养安东尼”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阿塔那修斯如此叙述若非是自己反智倾向的流露,可能便是为了神化安东尼而掩盖其父母对安东尼的教育失败,并进一步把这种失败描述成为安东尼日后在修道生活中取得成就的背景条件,也可能是这上述两种倾向的综合表现。

## 二 安东尼的生活道路之选择

从阿塔那修斯对安东尼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简短记述来看,安东尼没有受到中上阶层年轻人必备教育的原因可能既是由于父母的溺爱,也是由于他自己性格的原因。无论如何,当安东尼的父母在世时,安东尼完全可以享受作为父母爱子的愉快时光,在父母的羽翼下过着悠闲的居家生活。如果安东尼父母的寿命能够长到安东尼本人拥有足够的社会实践经验,那么安东尼即使缺乏教育,或许也能够和父母去世后担负起家长的职责,承担起自己应尽的义务。但是,安东尼的父母却在安东尼尚未做好任何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准备之前便双双谢世,当时安东尼大约18岁或20岁<sup>⑦</sup>,必须在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独自肩负起家庭的职责,照顾年幼的妹妹。

根据《安东尼传》的记载,在父母去世大约6个月时,安东尼如常前往教堂,正巧教堂内正在宣

<sup>1</sup> Athanasius *Life of St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 p. 30

<sup>④</sup>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II 16 Sozom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 18

<sup>⑤</sup> Theodoret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B. H. Field Jackson,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2, prolegomena p. 12

<sup>⑥</sup> Basil "To Young Men On How They Might Derive Profit from Pagan Literature", in St Basil *The Letters*, IV, translated by Roy J. Deferrar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III 1-4

<sup>⑦</sup> Athanasius *Life of St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 p. 31

讲福音书,他听到其中提到,上帝告诉富人,如果想要变得完美,就卖掉财产分给穷人,并将由此得到天堂中的财富。听到此言后,安东尼立刻离开教堂,把自己继承的财产和 300 阿鲁拉肥沃田地全部分给村民,以便这些财产无法再打扰他本人或他的妹妹。在卖掉所有其他动产后,所得金钱除留给妹妹的一小部分以外,其余都捐赠给了穷人。<sup>1</sup>从这一叙述来看,似乎安东尼的决定完全是出于福音的感召或圣灵感应,而阿塔那修斯更声称当安东尼前往教堂的途中时,正在思考众使徒是如何放弃一切追随救主耶稣,而在《使徒行传》中一些信徒又是如何出售自己的财产把所得放在使徒们的脚下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并由此在天堂中积累了巨大的赏赐。<sup>④</sup>关于安东尼当时前往教堂路上的想法,我们无法知晓阿塔那修斯是从何得知的。由于在阿塔那修斯本人写作的《安东尼传》中并无作者与安东尼曾经会面的记载,同时,在安东尼留下的信件中也没有提到任何主教或教士<sup>⑤</sup>,我们可以排除这一想法是由安东尼本人告诉作者的可能性。因此,阿塔那修斯在写作这段时可能使用了辗转相传的间接资料,也可能是阿塔那修斯由果推因,为神化安东尼对生活道路的选择而采取了虚构手法。无论是何种原因,这段描述都无法视为真实情况的可靠反映。或许安东尼在去教堂时确实正在考虑放弃所有财产,而这种考虑也很可能不能排除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但其中真正的关键之处在于为何这种“圣灵感应”会在此时影响安东尼,为何这种想法是在他双亲去世 6 个月之后而非父母去世当天或一周后才出现。

虽然目前没有文献记载表明安东尼的父亲或安东尼本人曾经担任过任何官职,但可以推测,作为村庄中最富有的家族或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安东尼一家必然担负着与晚期罗马帝国其他上层社会成员相似的义务。这些义务一般包括修缮公共建筑、为本地的节日赛会出资、调解村镇内部纠纷、担任村镇代言人在行省乃至皇帝面前保护本地居民利益等。例如,生活在公元 4 世纪安条克 (Antioch) 的利巴尼乌斯 (Libanius, 约 314–393 年) 在其文章曾提到自己的伯父与叔父分别在 328 年与 336 年承办了当地的赛会,自己父亲的朋友则举办了 332 年的赛会,同时指出承办赛会乃是富人的一项赋役。<sup>⑥</sup>在 410 年出任托勒麦斯 (Ptolemais) 主教之前,昔兰尼的西内西乌斯 (Synesius of Cyrene, 生年不详,约逝世于 414 年) 作为本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曾成为其故乡派往皇帝宫廷请求减免税收的使节<sup>⑦</sup>;向总督写信举荐熟人的亲戚<sup>⑧</sup>;为某人向埃及行政长官求情<sup>⑨</sup>;向宫廷中的显贵陈述自己故乡地方官的不法行为,请求对方向执政者进言以拯救受到残酷压榨的昔兰尼<sup>⑩</sup>;恳请法官多米提安 (Domitian) 帮助孤儿寡母<sup>⑪</sup>;甚至还为了抵抗匪帮而储存过 300 支长矛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并亲自出战<sup>⑫</sup>。即使在担任主教之后,除了教会事务的负担外,西内西乌斯仍然扮演着此前地方代言人的角色,请求君士坦丁堡宫廷中的熟人向皇帝要求增派 160 名士兵以协助打击滋扰乡间的匪帮<sup>⑬</sup>;向地方官抗议发明新刑罚以助其横征暴敛<sup>⑭</sup>。凯撒里亚的瓦西里出身豪富,其父老瓦西里广有田产,是一名出色的律师与修辞学家<sup>⑮</sup>,无论在担任凯撒里亚主教之前或之后,瓦西里本人在故乡都充任着与西内西乌斯在昔兰尼类似的代言人与保护人角色:为故乡居民向皇家财政官求情,请求发还他们的财物<sup>⑯</sup>;请求总督免除一名老人的赋役,这名老人因年纪老迈根据谕令本已经免除了赋

<sup>1</sup> ④ A thanasius *Life of St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 p 31.

⑤ Andrea Sterk, *Renouncing the World Yet Leading the Church: The Monk – Bishop in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

<sup>⑥</sup> Glanville Downey, “The Olympic Games of Antioch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 in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70, 1939, p 429

<sup>⑦</sup> Synesius *The Letters of Synesius of Cyrene*, translated by Augustine Fitzgeral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introduction, pp 14–19

<sup>⑧</sup>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 Synesius *The Letters of Synesius of Cyrene*, p 102, pp 105–106, pp 163–165, pp 254–255, pp 203–204, pp 167–169, pp 169–171

<sup>⑬</sup> Saint Basil *The Letters I*, translated by Roy J Deferrar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introduction, p xvi

<sup>⑭</sup> Saint Basil *The Letters I*, Letter XV, p 113

役,但总督却通过命令老人不满四岁的孙子接替老人在市议会中的位置而令老人不得不替幼孙承担赋役,瓦西里为此请求总督免除孩子的赋役直至其成年<sup>1</sup>;由于地方用于纳税的黄金尚未凑够规定数量,请求延期交税<sup>④</sup>;为一名寡妇调解家庭纠纷<sup>⑤</sup>;请求地方官减免税收<sup>⑥</sup>,等等。我们不知道安东尼的父亲是否曾担任过自己村庄或邻近城市的议员,但以其在当地的经济地位来看,安东尼一家是无法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独善其身而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当安东尼父亲在世时,与自己家庭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义务与责任当然都是由他承担,但父母一旦去世,作为家中长子的安东尼在继承家业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必须继承这些义务与责任。除了对自己所居住地区所负义务外,安东尼还必须承担对家庭的义务与对政府的义务,前者对安东尼个人来说主要是抚育幼妹,后者则主要以缴纳税赋为体现。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性格内向、不喜与外人交往、没有受过必要教育与训练、缺乏处世经验的年轻人,在父母双亡之后,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不仅继承了一笔在当地可算庞大的家产,同时也继承了随这份财产而来的责任,必然会产生彷徨无主的情绪,若是安东尼身处在另一个不同的年代,或许尚可逐渐适应,但他所处的时代却是一个“焦虑的时代”<sup>⑦</sup>,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均处在一个巨大的调整与转变时期,整个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难想到,当安东尼在双亲去世后的6个月中发现自己稚嫩的双肩无法在这种时代担当父亲给他留下的责任之后,在无法承受这种压力的情况下,安东尼很可能逐渐视家传的财富为烦恼之源,加上他出身于一个基督徒家庭,从小就曾学习圣经,当遇到生活中的危机中,很自然会向宗教寻求解脱之法,于是才在前往教堂的路上想到众使徒放弃一切所有追随耶稣基督的事迹,并因此才有当他在教堂中听到了要求放弃一切财富的宣讲后遵照行事的举动。据《安东尼传》记载,当他散尽家财后再次进入教堂时,听到正在宣讲“不要为明日忧心”之语,于是安东尼把妹妹托给村中受人尊重的贞女们照看抚养,自己则与其他隐士一样,在村庄附近隐修。<sup>⑧</sup>安东尼自己劳作,其所得部分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部分救济有需要的人<sup>⑨</sup>,后来前往离村庄较远的墓地里居住,并请他的一位朋友定期供给他面包<sup>⑩</sup>。当安东尼于35岁后进入沙漠中一座废弃堡垒中隐修后,有将近20年不出堡垒也几乎不为他人所见,他的朋友们定期来拜访他,能听见他在吟唱赞美诗。<sup>⑪</sup>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安东尼逐渐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修道士聚居地。

从对安东尼生活道路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圣灵感召这个原因暂且搁置一旁的话,很明显安东尼生活环境的变化对他选择修道生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安东尼的父母去世令无法承受骤然出现的各种压力的安东尼选择了隐居沙漠。如果说,对于安东尼个人而言,是由于自己所处环境的变化成为自己从前所受基督徒家庭影响发挥作用的触媒的话,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何种因素令安东尼式的修道生活逐渐成为当时人们生活道路的一种选择,并促使基督教修道生活在埃及兴起呢?我们知道,在安东尼生活的时代之前很久,埃及就已经有隐修者存在,耶稣与使徒们有关禁欲主义的各种教诲也流传于各个基督徒团体中,但为何基督教修道生活直到安东尼时代才真正成为教会与政府不得不予以重视的社会运动呢?基督教的传播、基督徒家庭的影响乃至前辈修道士的德行等自然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促使这些因素在这个特定时代起作用,导致人们追随安东尼(或其他著名修道士)投入修道生活的催化剂则是当时埃及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埃及的社会结构则成为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反应釜。

<sup>1</sup> Saint Basil *The Letters II*, translated by Roy J. Deferrar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Letter LXXXIII, pp. 107-109.

<sup>④</sup> Saint Basil *The Letters I*, Letter LXXXV II, p. 117.

<sup>⑤⑥</sup> Saint Basil *The Letters I*, Letter CV II, CV III, CK, pp. 205-211.

<sup>⑦</sup> Saint Basil *The Letters I*, Letter CX, pp. 211-213.

<sup>⑧</sup> E. R. Dodds, *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

<sup>⑨⑩⑪</sup> Athanasius, *Life of St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 p. 31-32, p. 32, p. 37, pp. 39-42.

### 三 安东尼生活时代的埃及社会经济环境是修道生活兴起的催化剂

安东尼生活于公元 3 世纪中期至 4 世纪中期,这正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世界动荡不宁的转折岁月。自 192 年康茂德 (Commodus 180—192 年在位)遇刺至 284 年戴克里先 (Diocletian 284—305 年在位)上台,罗马帝国爆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场危机是自公元 1—2 世纪以来不断积累的各种危机因素的总爆发。危机的表现形式为农业衰败、商业萧条、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财政枯竭、政局混乱、人口减少、社会底层民众不堪压榨而发动起义。与此同时,外敌也乘虚而入:日耳曼人频频突破帝国边境防御体系,劫掠各地;萨珊波斯则入侵两河流域与亚美尼亚。3 世纪危机震荡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整个地中海世界,但是具体到各个地区,危机的影响程度又各不相同。

就经济而言,与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相比,埃及在 3 世纪危机中受创较浅,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与活力。埃及的农业生产在危机中所受打击较小,成为其经济上保持相对繁荣的基础。埃及农业继续保有一定活力的原因则主要在于小农经济在农业生产中仍然保有相当的活力。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认为,在东地中海地区,由于希腊城邦和希腊化国家在罗马征服之前已经奠定了该地区基本的农业生产结构,小农经济与城镇商业互相配合,因此罗马的奴隶制大地产制度在帝国的东部诸行省未能如同在帝国西部地区那样得到普遍发展<sup>1</sup>,这是奴隶制危机对东部尤其是埃及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较为缓和的主要原因。有学者统计,在帝国晚期的埃及,奴隶约占城市人口总数的 13.5%,占农村人口的 9%—10%,这些奴隶——尤其是城市中的奴隶——大多是家务奴隶或主人处理日常事务的助手<sup>④</sup>,因此当奴隶制危机总爆发时,埃及农业生产并未出现严重的衰退现象。据估计,当时埃及赫尔墨波利斯地区年产谷物约有 38 万阿尔塔巴 (artaba 1 阿尔塔巴约合 30 公升),可以维持 8 万人的生活,而该地区总人口大约在 2.5 万至 5 万人之间<sup>⑤</sup>。在古代社会,农业是最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的相对稳定和繁荣为埃及的相对稳定和繁荣提供了保证。另外,在西部地区城市衰落、商业萧条之际,埃及城市以该地区相对繁荣的农业为基础,以当地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为辅,从事各种境内外贸易,有助于维持埃及经济的相对繁荣。埃及的亚麻工业、玻璃制造业、银制品制造业以及纸草制造业相当发达<sup>⑥</sup>,其制品经红海商路顶端的亚历山大里亚外运,东方的各种货物 (主要是宝石、香料、丝绸等奢侈品)则经由波斯湾—红海—尼罗河航线运抵亚历山大里亚,而亚历山大里亚本身就是埃及玻璃制造业与纸草制造业的中心<sup>⑦</sup>,繁荣的手工业和兴盛的对外贸易使这座城市成为东地中海世界的重要商业中心之一。埃及因其相对繁荣的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而成为帝国最富裕的行省。<sup>⑧</sup>

但是,埃及在经济上的相对稳定对于埃及地区的民众而言却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的稳定当然可以减少民众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困苦;但另一方面,在整个帝国财源枯竭而官僚与军队系统不断扩大的大环境下,埃及的相对富庶可谓是“怀璧其罪”。西塞罗 (Cicero 约公元前 106 年—公元前 43 年)在论述罗马与西西里的关系时,曾声称西西里之所以向罗马提供谷物与财富、供应罗马军队是因为罗马是西西里的保护者,甚至宣称“只要压迫者是罗马人,他们就能承受这种压迫”<sup>⑨</sup>。这在一定程度上道明了凭借一系列战争兴盛起来的共和国以及其后的帝国政府对各行省的态度:

<sup>1</sup> [英]佩里·安德森著,郭方、刘健译《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1—292 页。

④⑤ Roger S Bagnall *Egypt in Late Antiquity*, p 208, p 59, p 70

<sup>⑥</sup> A. H. M. Jones *The Decline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6, p 238

<sup>⑦</sup>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300—1300 年)》上册,第 25—26、198、203—204 页。

<sup>⑧</sup> Roger S Bagnall *Egypt in Late Antiquity*, pp 114—115

⑨ Cicero “The Second Speech against Gaius Verres”, in Cicero *The Verrine Orations*, Vol I, translated by L. H. G. Greenwoo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Book II, 1.2—III.8



被征服者理应为自己的失败与“受到保护”而向胜利者和统治者献出物产与金钱。这些税收不仅是用来补偿征服者的战争费用的,也是用来维持统治者不断扩大的军队与政府的必要资源。在征服埃及之前,西西里与阿非利加行省是罗马的谷仓,自从埃及被纳入罗马帝国版图后,它就因其富庶而成为帝国政府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埃及出产的谷物被源源不断运往帝国其他地区,号称为帝国的粮仓。到3世纪末4世纪初,一方面帝国内外征战不断,另一方面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一世(Constatine I 306–337年在位)又进行行政与军事改革,行省由47个增加至120个,军队规模扩大至约64.5万人<sup>①</sup>。上述行政和军事改革的用意是加强中央集权并增强帝国防御力量,但同时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果:行省的细分造成官僚系统的急剧膨胀,而军队的规模则达到元首制早期的4倍<sup>②</sup>,军人的供给、薪饷以及每当新皇登基或皇帝执政满5年时按惯例需要向官兵发放的现金赏赐<sup>③</sup>,再加上君士坦丁一世兴建新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巨额花费,这一切构成了对本已吃紧的国家财政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在3世纪危机以及4世纪前半期的各次内战中,埃及始终保持着相对的安宁,虽偶有市民暴动或周边游牧民族入侵,但未曾受到大规模战争蹂躏。在李锡尼(Licinius)与君士坦丁一世的决战中,虽然大批埃及居民被强征入伍——其中就包括日后集体修道制度奠基者的帕克米乌斯(Pachomius)<sup>④</sup>,但埃及最终也没有成为战场。埃及在此期间不断从一个统治者较为平稳地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中,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令这块富庶之土成为政府较为稳定的财源地,而帝国政府财政上日益增加的需求对于相对富庶稳定而又被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的埃及而言则意味着税收的不断增加。

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除了某些职业的希腊人与亚历山大里亚居民免税以外,所有14–60岁或65岁之间的埃及男性公民都必须缴纳人头税,而农村人口缴纳的税率又高于城镇人口。<sup>⑤</sup>4世纪时,埃及的人头税成倍增加,297至298年间奥克里克斯城(Oxyrhynchos)的人头税还是银币1200德拉克玛(drachma),到306至307年就增至1600德拉克玛,而312至313年间则升到了2400德拉克玛。<sup>⑥</sup>除人头税外,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还开征针对工场主和商人的“金银税”(Chrysargyrum),在埃及的征收额达10万索里德(Solidus)金币,约合1400磅黄金。<sup>⑦</sup>农业是帝国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为国库提供了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sup>⑧</sup>在君士坦丁堡建成后,埃及的谷物就成为维持该城居民生活的必需品,运去的谷物随城市居民的增多而逐年增加,最后达到每年80万阿尔塔巴的巨量<sup>⑨</sup>。学者估计,当时来自农业的税款大约20倍于来自手工业与商业的税款<sup>⑩</sup>,而帝国政府无论土地肥瘠与年景丰歉,均按同样税率划一征收<sup>⑪</sup>。生产的越多,被政府拿走的越多。<sup>⑫</sup>高额税收令小农无力承担,纷纷逃亡。在一份332年的请愿书中,埃及一处村庄中的三名市议员阶层的富人联名上书,请求地方官设法把逃亡的村民送回村中,因为他们三人必须负责为政府征收村中500阿鲁拉土地的税款,而这些土地却无人耕种,加上他们还要负责村中人头税的缴纳,已经不堪重负。<sup>⑬</sup>竭泽而渔的税役造成民不堪命的后果。这些逃亡的村民后来是否被官府抓回原地不得而知,但这份请愿书却反映了当时埃及社会中上层成员的困境。

<sup>①</sup>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Vol. iv,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4, p. 680.

<sup>②</sup> [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第81页。

<sup>③</sup> Jack Lindsay, *Byzantium into Europe*, London: The Bodley Head, 1952, p. 42.

<sup>④</sup> Amand Veilleux translated *The life of Saint Pachomius and His Disciples*, Kalamazoo: Michigan Cistercian Publication Inc., 1980, p. 27.

<sup>⑤</sup> A. S. Hunt and C. C. Edgar, *Select Papyri*, Vol. I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introduction, pp. xxv–xxvi.

<sup>⑥</sup> <sup>⑦</sup> Roger S. Bagnall, *Egypt in Late Antiquity*, p. 154, pp. 153–154, p. 311.

<sup>⑧</sup> <sup>⑨</sup>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Vol. II, p. 769, p. 463, p. 465.

<sup>⑩</sup> M.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second edition,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p. 523.

<sup>⑪</sup> A. S. Hunt and C. C. Edgar, *Select Papyri*, Vol. II, p. 301.

帝国后期,大多数税款主要由市议员负责征收,国家派官吏予以监督。由于小农负担日益沉重,欠税不断增多,市议员往往为补足税款而破产,埃及小农受到的压榨经由这一征税制度而向中上层社会成员传递。“负担”已成为市议员职位的代名词,他们纷纷逃往具有特权地位的教会、军队或政府以求喘息。<sup>1</sup>逃税的机会与特权令人们对官职趋之若鹜。<sup>④</sup>但是,这种机会是有限的,而一名市议员即使能成为政府官员,他也必须随时做好被免去官职的准备。总体来说,这一阶层是在走下坡路。<sup>⑤</sup>同时,为了保证税收,加强对市议员的控制,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通过多项法令,规定他们的强制性义务,把他们固定在现在的职务上。328年5月9日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公役职位应授予有力人士,其次才是中下层人”<sup>⑥</sup>,因为前者有能力在地区发生欠税时予以补齐。在此之前的325年6月11日他已经规定“凡出身市议员家族者,或其本人曾被提名参加城市议会,均需承担城市义务”<sup>⑦</sup>;为防止官员私相授受,他早在313年就下令“任何法官不得尝试豁免城市议员的强制性义务”,亦不得擅自解除市议员资格。<sup>⑧</sup>325年12月25日颁布的法令给那些企图借转换居住地逃避税役的中产阶级以致命打击。这条法令规定,“若出身于城市者(无论市之大小),为逃避其在原城市应负之义务而设法转入另一城市,并试图上书申请准许其定居,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逃离自己原来居住城市,则应让此人承担上述两城市议员之双重任务,其一是由于其本人所愿,另一则由于其人之出身”,在军队、政府、教会中任职的市议员除国家不可缺少者外,都必须遣返原籍承担市政义务。<sup>⑨</sup>这样,逃往其他职业与其他城市的道路皆从法律上被切断,中等或中上阶层的经济地位带来的是日益加重并足以导致他们破产的负担,除非拥有足够高的地位或是足够强硬的后台能从政府获得各种免税免役特权,否则,其中不堪忍受者要想摆脱这一重负的话,如若他们不敢、不愿或没有能力举旗造反,唯一的出路就是主动降低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并逃出政府能够实施较为有效管辖的居民点。

根据阿塔那修斯的记载,出生于251年左右的安东尼是在大约18或20岁时开始隐修生活,时为公元269年或271年;安东尼在35岁进入沙漠堡垒中隐居,此时约为公元284年或286年;当他在堡垒中隐居时,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来到这里,在安东尼于304年或306年走出堡垒时,已经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修道士聚居地,并且在随后的日子里,追随者不断增加。可以看出,安东尼式隐居修道生活影响日增与同时期埃及小农以及中上阶层负担日益沉重乃是发生于同一个时间段之中。早期隐居者的德行、自然环境适宜于修道生活、禁欲主义传统、埃及人对罗马统治的反感情绪等在基督教修道生活兴起于埃及的原因中当然有各自的一席之地,但当时埃及的社会经济环境却是促使这些因素在这一时代互相反应起作用的催化剂,否则难以解释为何这些存在了数个世纪的因素没有在3世纪危机之前导致修道生活的兴起。当生活日益无望之时,安东尼以其实践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选择。通过口耳相传,人们突然发现学习安东尼式的修道生活不仅可以摆脱繁重的负担,而且或许能令自身更接近上帝(同时期或稍后教会史家与教父们常提的原因),自然会有一部分人转向这种生活。实际上,由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稍后于安东尼生活时代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v, 364-375年在位)和瓦伦斯(Valens 364-378年在位)就曾在共同颁布的诏令中痛斥许多人见到修道生活的好处而放弃他们的义务,逃至荒僻之地,加入修道士的行列,以便过轻松的生活,要求埃及地方长官把他们带回原地。<sup>⑩</sup>但很明显,法令并未得到有力执行,因为到帕拉迪乌斯(Palladius 生于约363或364年,卒于约420-430年间)为埃及修道士圣徒树碑立传时,

<sup>1</sup> M.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p. 524.

<sup>④</sup> Ramsay Macmullen, “Imperial Bureaucrats in the Roman Provinces”,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68, 1964, p. 307.

<sup>⑤⑥</sup> M.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second edition, Vol. I, p. 526.

<sup>⑦</sup> ½ ¾ ¼ Clyde Pharr translated,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11, p. 16, p. 4, p. 12, p. 1, p. 10, p. 12, p. 1, p. 1; p. 12, p. 1, p. 12.

<sup>⑩</sup> A. D. Lee, *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Late Antiquity: A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201.

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以西的沙漠地带尼特里亚 (Nitria) 地区已经聚居了 5000 名修道士<sup>1</sup>, 而在奥克里克斯地区, 据说修道士的居所甚至多于普通人的房屋<sup>②</sup>。在更偏僻的塞克提斯 (Scetis) 地区居住着 3500 名修道士, 而阿尔西诺特 (Arsinoite) 附近则据称有 1 万名修道士。<sup>③</sup> 当社会经济环境恶化时, 修道生活为无法承受负担的埃及土地所有者或其他职业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安东尼或其他同时代的修道士圣徒之所以能吸引人们追随, 正是由于他们以自己的切身实践向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展示了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

埃及的社会经济环境虽然成为其他因素在修道生活兴起中发挥影响的催化剂, 但只有从埃及的社会结构出发, 才能解释为何遁入沙漠成为当时部分埃及人眼中逃避社会压力的一种可行方式。

#### 四 埃及的社会结构是修道生活兴起的重要平台

我们知道, 在罗马帝国西部, 若想逃避税役, 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是把土地投寄给大地主, 主要为中小土地所有者所采用; 二是啸聚山林, 以暴力反抗暴政, 如 3 世纪中后期至 5 世纪末期高卢与西班牙的巴高达 (Bacaudae) 运动, 主要有奴隶、隶农、逃兵、小农以及极少数中上层社会成员参与。<sup>④</sup> 但在埃及, 与西部有所区别的社会结构则成为第三种方式兴起的平台, 这第三种方式就是基督教修道生活。

如前所述, 埃及的社会结构是以中小土地所有者为主体, 大地主以及奴隶或隶农所占比例较小, 而这些埃及大地主所拥有的财富与社会地位与帝国西部的元老贵族相比完全不在同一水准。

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元老贵族掌握了该地区大量劳动力与耕地, 在 4 世纪, 西部元老贵族的平均收入达到 1 世纪元老贵族收入的 5 倍<sup>⑤</sup>。西部财富最多的元老, 每年有相当于 4000 磅黄金的进帐, 此外实物 (谷物、葡萄酒等) 收入的价值相当于前者的三分之一; 中等收入的元老年均收入约为 1000—1500 磅黄金<sup>⑥</sup>, 属于这个级别的贵族女子梅兰妮亚 (Melania the Younger, 约 4 世纪末—5 世纪初), 在意大利、西西里、北非、西班牙、高卢、不列颠拥有大量土地, 据记载, 仅在罗马附近她就拥有 62 个村庄, 在每个村庄中有约 400 名奴隶 (总计约 2.5 万) 为其耕作<sup>⑦</sup>, 年均收入 12 万索里德金币, 约合 1600 磅黄金<sup>⑧</sup>, 相当于两个北非行省 (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 年财政收入的总和<sup>⑨</sup>; 401 年, 西部元老塞马库斯之子出任罗马市长, 按常规应出资进行公共竞技和表演, 塞马库斯为此花费 2000 磅黄金<sup>⑩</sup>, 塞马库斯本人则在意大利拥有 12 个大庄园, 在西西里与毛里塔尼亚也拥有大片土地<sup>⑪</sup>; 阿米安更在其著作中感叹罗马贵族骄奢淫逸, 占有大量奴隶, 以致上街时身后跟随着一支奴隶大军, 每人带 50 个奴隶耀武扬威尚嫌不足<sup>⑫</sup>。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地是, 受到皇帝大力扶持的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成员的财富远不及西部元老贵族: 君士坦丁堡最高等级元老的全部财产仅相当于罗马中等

<sup>1</sup> Palladius, *The Lausiaca History*, translated by W. K. Lowther Clark,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8, Chapter VII 2, p. 58.

<sup>②</sup> Charles A. Frazee, "Late Roman and Byzantine Legislation on the Monastic Life from the Fourth to the Eighth Centuries", p. 266.

<sup>③④⑤</sup>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Vol II, p. 930, p. 782, p. 793.

<sup>⑥⑦</sup> G. E. M. De Ste. Croix,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from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478.

<sup>⑧</sup> 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9, p. 34.

<sup>⑨⑩⑪</sup>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Vol I, p. 554, p. 554, p. 555.

<sup>⑫</sup> Chester G. Starr, *The Roman Empire 27. BC-AD 47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70-171.

<sup>⑬</sup> Sarah Scott, "Elites, Exhibitionism and Economy in Italy, 1500 BC - AD 1500", in Neil Christie ed. *Landscapes of Change: Rural Evolutions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 42.

<sup>⑭</sup> Ammianus Marcellinus, *Res Gestae*, Vol III, translated by John C. Rolfe,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8, p. 4, p. 69.

收入元老一年的收入,当出现预算之外的大笔花销时,若无皇帝搭救将有破产之虞<sup>①</sup>;在当时,东部元老担任君士坦丁堡市长时所举行的公共庆典花费一般为 1000 磅白银或 70 磅黄金<sup>②</sup>;最富有的东部元老拥有的土地也不及西部元老大家族的十分之一<sup>③</sup>。如果说 4 世纪中后期时东部最富有的元老也不过如此的话,安东尼生活时代的埃及大地主所拥有的财势与同时期西部大地主相比则可谓不值一晒。据统计,在 4 世纪时,埃及城市赫尔墨波利斯拥有 10 阿鲁拉左右土地的居民约占城市总人口的 53%,拥有 11—100 阿鲁拉土地的居民约占 35%,拥有 100 阿鲁拉以上土地的大地主约占 10.8%;在另一个城市安替鲁波利特斯 (Antinoopolites) 的相应比例则分别是 40%、49% 与 11.2%。在赫尔墨波利斯,拥有 201—500 阿鲁拉土地者有 6 人,占有 501—1000 阿鲁拉土地的有 3 人,另外有 6 人拥有 1001 阿鲁拉以上土地,而在安替鲁波利特斯没有人拥有超过 501 阿鲁拉以上的土地,拥有 201—500 阿鲁拉土地者则有 3 人。<sup>④</sup>与此同时,这些大地主的地产也没有形成如同西部那样的大田庄,他们的地产以小块形式分散在不同地区。<sup>⑤</sup>

埃及大地主的财势既然远不及西部同类,他们与政府的对抗能力自然也相应缩小。在帝国西部,元老贵族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关心中央集权和皇帝的生死存亡,只顾保护自己的财产,在乡间自己的地产上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sup>⑥</sup>。这些大地主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获得特权直接向行省总督缴纳税收,同时负责向自己的佃户收税<sup>⑦</sup>,小农无力与其竞争,加上天灾人祸和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不得不托庇于大地主,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力量<sup>⑧</sup>,在大地产拥有者的领地内,他们自行其是,不仅武装起自己的私兵<sup>⑨</sup>,而且庇护逃兵和逃役农民,与政府争夺劳动力,在 396 至 412 年间 (正是西部地区最需要士兵的时候,在此期间的 410 年罗马城被“蛮族”攻陷),西部政府共发布了九道惩治逃兵和逃避兵役行为的法令,但高卢和北非的大地产主大多对此则置若罔闻<sup>⑩</sup>,即使偶有遵从政府法令者,向政府交出的也多为老弱不堪为兵之人<sup>⑪</sup>。反观埃及,土地虽然也逐渐在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但集中程度远不能与西部地区相比。早在公元前 73 年,西西里的主要小麦产区利奥提尼 (Leontini) 的 84 名大地主就已经人均拥有约 1.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与此相比,直到 4 世纪中期,埃及的赫尔墨波利斯的大地产主人均拥有的土地也不过 19.1 公顷。<sup>⑫</sup>这意味着安东尼生活时代的埃及大地主的社会经济地位根本无法和西部同类相提并论,他们在埃及本地或是帝国东部地区或许可以算是上层社会成员,但从整个帝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具有西部大地主的经济政治实力,这就决定了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西部元老贵族。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大地产主充当保护人,以投寄土地逃避税役的方式在埃及虽然存在,但发展较为缓慢,无法全部吸纳有这种倾向的土地所有者。实际上,直到 5 至 6 世纪,著名的埃及望族阿庇昂家族 (the Apions) 才取得了西部大地主早在数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拥有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6 世纪时,阿庇昂家族在奥克里克斯与塞诺波利斯 (Cynopolis) 拥有 11.2 万阿鲁拉土地<sup>⑬</sup>,在赫拉克勒波利特 (Heracleopolite) 与阿尔西诺特也拥有大量土地<sup>⑭</sup>,他们在君士坦丁

<sup>①</sup> ④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 pp. 554-555, p. 555.

② A. H. M. Jones, *The Decline of the Ancient World*, p. 53.

<sup>③</sup> <sup>④</sup> Roger S. Bagnall, *Egypt in Late Antiquity*, p. 69, p. 70.

<sup>⑤</sup> 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4 页。

⑥ G. E. M. De Ste Croix,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from the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s*, p. 222.

⑦ Samuel Dill, *Roman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73, p. 262.

⑧ H. St. L. B. Moss, *The Birth of the Middle Ages 395-814*, Lond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0.

⑨ Samuel Dill, *Roman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p. 236.

⑩ Jack Lindsay, *Byzantium into Europe*, p. 39.

⑪ R. P. Duncan-Jones, "Some Configurations of Landholding in the Roman Empire", in M. I. Finley edited, *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 London, New York,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3-14.

<sup>⑬</sup> <sup>⑭</sup>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I, p. 780, p. 784.

堡也有政治影响力,甚至有家族成员与皇族联姻<sup>1</sup>。但是,在安东尼生活的时代,埃及并没有这样的豪门望族,虽然土地兼并已经开始,但正如历史中常见的土地兼并现象一样,埃及的土地兼并也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埃及大地产主的真正形成是建立在大量中小土地所有者倒下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过程到5至6世纪时才显示出结果,而在安东尼生活的时代,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不久而已。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所迫,埃及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在无法承担压力的情况下,无法轻易找到一个合适的投寄土地对象,因为即使是如安东尼那样拥有300阿鲁拉土地的所谓“大地产主”,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庇护更弱小的土地所有者。这样,当人们发现安东尼式的修道生活既能够逃脱官府压迫,又可以免于因暴力反抗引来的生命危险,还可以获得良好声名,这种生活自然会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

当然,不能排除确实有因为自己的信仰或是被类似安东尼这样的修道士圣徒的德行感化而参与修道生活之人,但问题是这样的人在所有修道生活的参加者中究竟占多大比例。实际上,即使在经过作者精心选择以宣扬修道生活的著作里,也有完全出于世俗考虑而参与修道生活的事例:一位富人去世后,留给两子每人5000金币以及衣物、奴隶等财产,两兄弟在讨论今后过何种生活时,认为经商与其他世俗生活方式风险很大,而简朴的修道生活则可以回避世俗生活中的种种危险,于是决定过修道生活。<sup>④</sup>如果考虑到埃及沙漠早期修道士多为如同安东尼那样缺乏高深文化修养与神学训练的农民<sup>⑤</sup>,那么可以设想,完全由于虔诚信仰而投身修道生活者恐怕不会占过大的比例。另外,我们可以设想,作为上层社会成员的安东尼,一方面,他的选择可能会对社会地位与他接近的同一阶层部分成员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与同一地区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差别不如西部元老贵族与小农的差别那么巨大,他这种摆脱束缚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也会令与他面对同样或更困难处境的人们产生效仿之心。正是埃及这种中小土地者占大多数,以及上层社会成员经济与社会地位普遍不及西部同类的社会结构,成为基督教修道生活在埃及兴起的重要平台,为修道生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参与者。

## 余 论

学者一般公认埃及的气候和地形适宜于修道生活,“在尼罗河流域,有着不很高的山岭,那里的无数自然洞穴,足供原始禁欲者以居所。那干燥的气候和隐士自己的孤寂生活,使他不需很多衣服,而且他所需要的微少生活资料,即枣子和黍稷,也是容易获得的”,汤普逊就此认为修道生活起源于埃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sup>⅜</sup>但是,自然环境适宜于修道生活只能证明埃及有产生修道生活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证明埃及一定能产生修道生活。自然环境如果无人利用,那就无所谓是否适宜的某种生活,而人之所以选择某种生活方式,是由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安东尼生活时代的埃及,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对民众的产生的压力促使自然环境、禁欲传统、基督教思想等各种因素在埃及的社会结构这个平台上综合作用,令安东尼式的修道生活成为部分社会成员的一种选择,从而使埃及成为基督教修道生活的滥觞之地。

(责任编辑:何方昱)

<sup>1</sup> Richard A. Ston, *The City in Roman and Byzantine Egyp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108.

<sup>④</sup> Palladius, *The Lausiac History*, Chapter XIV, pp. 68–69.

<sup>⑤</sup> James O. Hannay, *The Spirit and Origin of Christian Monasticism*, London: Methuen & Co., 1903, p. 104.

<sup>⅜</sup>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第174页。

per Clocks and Watches of Suchow in Qing dynasty but some scholars thought that the beginning time was during the reign of Kangxi Emperor instead of Jiaqing.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uthor's arguments one by one and thought the basis of those who doubted the time needs further discussion.

###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for the Rise of Religious Life of Christianity in Egypt—Start from the social status of Anthony**

**DONG Xiao-jia**

The monastic life of Christianity rose in Egypt between the later third century and the middle fourth century. And it was a result which was led by a combin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In these factors, the social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Egypt was the catalyst to put other factors to be synthesized in this given period.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Egypt was the platform for the prosperous of the monastic life.

### **On the Great Recession of the U. S. in the 1930s**

**ZHANG He-sheng**

From the 1920s to 1930s, American economy underwent a dramatic change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which became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in the American academic world for years. People have learned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hat the government decision is vital in stabilizing the economy and financial system and helping people pull over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 **The Kennedy Government's View on Current Affairs and Its Policy Towards China**

**ZHANG Yi-feng**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many new independent countrie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appeared and there was a new round of competition of social system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Cold War. Particularly, the Kennedy government considered the ideology and diplomatic behavior of China a threat to the social system and ideology of America, thinking the west may fail in the competition. The judgment of Kennedy government formed the basic attitude of the U. S. toward China, which made China the major target of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 **Theories and Researches of Modern Chinese Parks—On Reading Cities and Parks**

**CUI Zhi-hai**

The word park first appeared in Wei-Jin Dynasty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hile the definition of modern park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n modern park theories, *Cities and Parks* by Chen Zhi, an expert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eviews relevant researches on this field and described the features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arks.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further study can be made.

###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Public Health of Modern Chinese Cities in New Historiography Perspective**

**LI Zhong-ping**

The research on public health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was initiated by the medical history and public hygiene experts in Republican China. And a breakthrough of the research has been made since 1980s and 1990s, especially, in the new century. This great progress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subject-crossing research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sociology, ecology, medicine, public hygienics in the new situation when it is urgent for historiography to reply the self-developing crisis and strengthen the humane and real concern. In other words, the breakthrough is actually the product of historiography reform.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public health of modern China and modern Chinese cities is being in a growing condition, it needs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a.

(葛鉴瑶 译)